

古籍整理与研究

第七期

758

《古籍整理与研究》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出版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

古籍整理与研究

第七期

《古籍整理与研究》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本刊顾问 白寿彝 邓广铭 周祖谟

主 编 孙钦善

副主编 严绍璦 安平秋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有*者为常务编委)

*马樟根 刘烈茂 *安平秋 *孙钦善 李国章 李剑雄
李解民 *严绍璦 吴 枫 沈锡麟 陈金生 金开诚
宗福邦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裘锡圭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

古籍整理与研究

第七期

《古籍整理与研究》编辑部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16·18¹/₄印张·340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册 定价: 9.50元

ISBN 7-101-00891-7/K·364

目 录

编者按.....	(1)
李一氓同志的讲话	(2)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新局面开拓者	周 林 (11)
——缅怀李一氓同志	
《逸周书》著录证闻	郭殿忱 (15)
《韩非子》版本源流述略.....	张 觉 (23)
银雀山竹简《王兵》篇初探	骈宇騫 (35)
读史札记	陈福林 (45)
刘氏书录研究.....	李解民 (51)
读《释名·释地》以下六篇	顾颉刚 (71)
关于《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的 标点和解释.....	王仲殊 (75)
卢思道诗文校读札迻	祝尚书 (85)
《昭陵碑录》的史料价值	焦 杰 (95)
评点校本《安禄山事迹》.....	毛双民 (109)
辛稼轩交游事迹考补	辛更儒 (123)
《全宋词》辨误	张朝范 (137)
《輿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	邹逸麟 (149)
《輿地纪胜》的成书年代.....	李德清 (165)
《增订湖山类稿》商兑	杨积庆 (169)

编者按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不幸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逝世，全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古籍出版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领导。为悼念李老，本刊特发表他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在教育部召开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的讲话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缅怀李一氓同志的文章。

李一氓同志的讲话，对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和具体问题都讲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对古籍整理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也有很好的指示，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都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悼念逝者的最好办法是继续他未竟的事业，使其发扬光大。古籍整理与研究事业，是批判地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不可或缺的一环。它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作为当今的一代人，为了这一事业，需要的是公而不私的事业心，需要的是与广大专家学者（就古籍整理工作者来说，高校约占 2/3）齐心协力，需要的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以此求得事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得到健康发展。

谨以此悼念一氓同志这位老共产党人，这位古籍整理工作新局面的开拓者。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

李一氓同志的讲话

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我和周林同志合作,我当组长,他当副组长,还有别的同志。成员和顾问的名单在一年前已公布过了。必须声明一下,这个小组就是小组,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这个小组原来是1958年搞全国科学规划时成立的,到“文革”时没有了,许多成员都故世了,带头的齐燕铭同志也故世了。剩下两位还留在小组里面,就是叶圣老和冯友兰先生,年纪也很大了。我们小组还是照从前的规定,中间附带一笔,就是依靠中华书局工作。中华书局只管古籍的出版,而这古籍有个先例,当时定为文史哲。文史哲以外的古籍,像医学部分,分给卫生部;农学部分,分给农业部;科技部分,分给科学院;美术部分,分给美术出版社。还有地方志,即省志、县志,现在有宋代、元代、明代留下来的一些古本,中华书局要出版几十种宋元方志,上海古籍书店承担了天一阁的明代留下来的许多县志府志的出版。还有一些古籍,或者基本上没有用处,或者暂时没有用处,或者用处很小,比如看阳宅的,看阴宅的,还有看手相的,这种书也有明版,就用不着整理了,有的可以暂时放下来。我们现在所讲的古籍整理,就是整理文史哲史籍。听说商业部的同志要整理烹饪的即饮食的古籍,并且还有一个《烹饪》杂志,那么,关于这部分,就请他们负责了。

现在,能够承担文史哲古籍整理的专家人数比较少,年纪也比较大,中青年中能够承担整理的人数就更少一些,这就要求培养古籍整理的人才。北大有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招生人数很少,整理工作开展以后,就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了。因此,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选择若干大学成立有关古籍整理的专业或研究单位。今天这个会,就是教育部为此目的召集的。在这个会上,周林同志已经有一个报告,有一个规划,有详细的安排。培养人才问题,就由教育部承担起来了,我们小组就不管了。虽然与教育部是合作的,但具体的问题,如招生、分配等,都是教育部的事情,小组不干预,也没有什么意见。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外语要求问题。

有关中国古典的文史哲以及其他方面的学问,日本叫汉学,而英文叫中国学、东方学,一般叫汉学。中国文化带有世界性,因此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英国、美国、法国,从前还有瑞典,对于中国文化领域的各个学术部门,都有人进行研究,而且也有些研究成果。从中国本身来讲,比如我们搞元史的、搞中西交通史的同志,如果不懂外文,就一步也不能走。

现在教育部安排的古文献专业的课程里有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非常适当。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外语当作普通的应付的事,必须下点苦功,用点力量。特别是日文,现在日本出的东西很多。还要加强英语。是不是还要搞点俄文或别的外文?暂为慢一点。讲到俄文,俄国人搞中国学的学者也不少,贾丕才就是搞屈原得的博士,他原来是苏联外交部东方司司长,现在是副部长,他就是搞屈原、《楚辞》得了个博士。总之,我们要看重这个问题,否则就会给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因此我建议,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除了要学校勘、训诂……之外,要注重一下外文。

以美国籍贯的面貌出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美国用英文写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的著作,在日本的,在英国的也有。我们有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这套东西,在美国就出了二百个博士。因为我们已经将材料收集起来了,有体系地放在一块,便于搞研究的人从那些材料里面搞出一些名堂来。请各大学的同志,对要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外语学习,要有所注意。是否能够大分工一下,哪些单位以日文为主,哪些单位以英文为主。这就表示,我们小组与教育部关于人才培养的合作方面,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有同样的看法,这个事情可以在若干年后见成效。

第二个问题,关于研究与整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可讲的,没有什么必要争论的。目前的情况都是一些安排处理所发生的问题。是不是搞研究的同志对搞古籍整理的同志有高一等低一等的想法,我想也不一定。这些年由郭沫若同志带头搞了个《甲骨文合集》,13本,今年全印出来了。甲骨文合集不能说是研究成果,但却是最大的整理成果,不是人人可以担任下来的,实际工作是胡厚宣先生完成的。我们知道,从前严可均搞过《全上古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文》,清朝人还搞过《全唐诗》,《甲骨文合集》可不可暂时叫做《全商文》?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赛过它的。我们要研究商代的历史,王朝、地理、社会、农业、民俗,以及其他的问题,不研究甲骨文就难于动手。这个东西是很难的。甲骨文一共有那么多片,可能还要发现新的,现在印出来的13大本,是不是有些字还不认识?还要下很多功夫,才能够比较好地把空白填补得更充实一点。我个人认为,这部书是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最大的文化上的成就。甲骨文,从孙诒让、王国维以来,还有罗振玉及其他人,现在的胡厚宣,加上中年学者裘锡圭,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从前都是很零散的,无非是解释一个一个的字,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朝代或当成一个民族的文字记录把它联系起来,现在我们做了这一步工作。这部书可能销路不多,一千多块钱,13大本,有人拿到它也不认识,但是它的价值除了作为商代的历史研究资料之外,从文字研究方面来讲,它与周代的金文结合起来,这里有好多学问,可以说是三十多年来我们最大的成就。近年来,有些方面的议论,认为我们与台湾比较,

似乎台湾关于这方面的东西还出得多一些,出得好一些。但从学术价值说,还是我们超过他。《二十四史》的标点本,是解放以后由毛主席亲自提议标点的。当然,《二十四史》现在的标点当中,还有些差错,校对的时候还有些错字。但是,这工作是由北京和北京以外的历史学家完成的,而不是由台湾的历史学家完成的。台湾拿了去,照印。我们确实确实做了好多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的工作,这几年有不少这样的东西。

整理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研究。如果把整理同研究对立起来,好象是两个工作,你研究你的,我整理我的,这是不对的,这是顺序的两项工作,好像工艺流程的一条龙一样,从原材料开始,到成型组装为止,整理工作是不可没有的。不能把整理和研究看成是对立的东西,好像我搞研究的人比你搞整理的人高一筹,可能不会有这种看法。但是现在确有些人不愿搞整理工作,因为第一,有人对整理工作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标标点点没什么本事”。第二,涉及到教育部。听说一个教师在大学里搞整理,升副教授,升教授,什么都没有他了,因此,许多人不愿意。而且还规定了教授、副教授、讲师,每年非教多少节课不可,不教多少节课,什么都没有了,这样一来,他要求去讲课,不愿意搞整理,这都是工作安排上的一些矛盾。这矛盾怎么样解决?是不是请教育部从长计议,看哪些教授或讲师适合于整理,今年就让他整理一年,明年他去教书;今年教书的教师,新的学期招生之后,去搞整理,这样同等待遇,在升级的时候,大家都有份,这样大家都有积极性了。

至于怎么整理,对于研究人员来讲,搞注解,搞注释,搞得很多很多,并不需要。我的意见,还是着重资料的系统性,就像刚才讲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那样,比较便于研究。这不是单纯的标标点,而是要动一番脑筋的,应该收集一些什么东西,哪一些用全书,哪些用删节,删节的应是哪一部分,哪一类摆在前面,哪一部摆在后面,这都是很花功夫的。当年,这部书是花了很多功夫的,现在有的搞历史的同志,不大赞成这一方法,认为这一方法不行。但我们整理小组,还想跟着这条路发展下去。因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原来有一个题目,叫《北洋军阀》,现在大体上完成了,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制宪运动》。立宪,从清朝开始,这同洋务运动不大一样,同戊戌变法也不大一样,比如说联省自治,一直到后来算到国民党的宪法这样一些内容,以及当时清朝的咨议局,这些汇总一块,或叫做立宪运动、制宪运动。太平天国的资料比较多,现在还准备续下去。我们想这样的整理方法还要继续下去。

关于整理的次序,有的同志提出先要解决急需的,把暂时不需要的摆在后头。从理论上说这是不错的,但是要把中国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内容,一下子摊开来排次序,据说有八万种,即使把我们刚才排除了的不计算,只以文史哲来讲,就算三万种,要把它排成一、二、三、四、五……,排到三万,暂时也是难以办到的。可能有某一种书,有某一个项目是很紧要的,

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专家,相反的,不急的东西,刚好有人有兴趣,又花了一点功夫,只要再加一点力量,成品就出来了。这可能在将来会引起议论,那么,我这个小组,就只好照毛主席的说法,“硬着头皮顶着”。我们发给大家的,去年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那里面列进去的都是急需的吗?不一定,可能有些十年八年不需要,而有些没有列上去的,可能还要先整理出版。当时,把这个规划定下来,用一句政治术语说,叫做“宜粗不宜细”,定下来再说。我们已经声明了,没有包含进去的,有人提早整理好出版,也可以。有些东西暂时找不到人承担,压下来,也可以。这规划要实行九年,要是一点也不能动,搞文学的,搞哲学的,搞历史的,看了都百分之百的举手,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东西虽然有合法性,但要加一点什么,国务院也不会反对,这又不是什么工业、商业的规划,增加一点东西就要算钱,这个东西增加二十本也没有什么关系,国家不发生投资问题,只会出现这本书好不好,有没有专家能够承担的问题。因此就请在座的同志在这本子之外,还能够推荐或自己提出来,有什么书是很急需的,或者手里已有稿子的,或者虽然没有稿子,但是急迫需要的,我们的大学可组织力量,先把它完成,我们小组也愿意接受。

整理的另一个问题,去年《文学遗产》第三期上面有个小消息,就是社会科学院的文学遗产编辑部,请了一些搞古典文学的青年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青年同志反映:第一,目前许多研究工作都集中在几个主要的人物或主要题目上面,是不是还要分散一点。第二,在若干年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又把它挑出来,文章写来写去,还是三年前的结论,是不是能搞点新鲜的东西?青年同志已经看出了问题的所在。在整理的项目上,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李白、李白、李白……不知道有多少,杜甫、杜甫、杜甫……又不知道有多少。去年出的书,是不是搞烦琐哲学啊?《古文观止》有6种,中华书局1种,吉林1种,湖南1种,江西1种,中国书店1种,天津1种,有的有新的标点和注释,有的是老注释。《唐诗三百首》出了5种,《千家诗》出了4种,《文心雕龙》出了5种,至于文学刊物上讨论《文心雕龙》的,不知道有多少篇,这样整理起来,正如青年同志指出的,同样的问题,我得买5本《文心雕龙》。当然,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是普及读物,还有一点商品观念的问题,出一些可以赚钱。《文心雕龙》不一定畅销,但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去搞它了,有些题目就没有人搞。因此,面要稍为宽一点。我们在去年下半年给各个省的省委,各省委宣传部、出版局、出版社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自己安排一下,出版一点本省的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的重要著作,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小组的负担,出得也快。假若说在这三千多种之外,每个省就其省的范围之内,一年出5本,每年就有一百多种,占的份量就很大了。这个事情,已经引起各省委、省委宣传部以及出版机构的注意了,逐渐在成立两个机构,一个是省委宣传部下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再一个是省的出版社或合作或分开作些出版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成

效。当然,各省的古籍出版小组是属于各省的,与我们不是条条关系,不归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管。省里出的钱多,事情就办得多;出得少,就办得少。最近江西社会科学院的党委书记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要成立古籍整理小组,要我批准,我说请省委批。至于出些什么书,这事可以商量,反正以你们江西为主,你不要管湖南、安徽的事,不要管湖南、安徽的人物,还有像欧阳修这样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你也不要管,由北京来管,带全国性的,你不要去花这个力量。还有,每个省的图书馆里都有些地方作家的稿本,究竟学术价值有多大,我们一不知道作家的名字,二不知道书名,三不知道内容,我们无法提出,你们可以把图书馆里的稿本翻一翻,可能有好东西埋藏在那里面,别人不知道,你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至于四川,他们列了四川作家的名单,从秦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好几百人,有的列了著作,有的没有列著作,我们希望他们自己做,比如说今年的书目上有《薛涛诗笺》,这本稿子原来在中华书局,我们让给他们了。对这个人物不管何种评论,她总是四川的一位女诗人,至于她的身世怎么样,我们暂时不研究她,也不能说她是妓女,她的诗就不值钱了,如果是大家闺秀,诗格就提高了。这样就使得整理工作更容易迅速开展。去年山东把《聊斋志异》的钞本印了。湖南把同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有关系的郭嵩焘的日记整理了,这对于近代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在座的都是各省来的,我再一次提请大家注意,各省要在自己的范围内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文学、哲学、史学,甚至于医学、美术、科技、农业古籍,各省出版社要担负起来。只要出一些好书,我们是很欢迎的。

至于说到研究的问题,有一种意见是,整理归整理,研究归研究,搞整理工作不涉及研究,整理完了就行了。但是,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比如说《郭嵩焘日记》出版了,但是《郭嵩焘日记》里面的东西,作为近代史研究还得从头作起。这些工作,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空白。比如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要搞什么史、什么史,到解放的时候,除了范文澜的通史之外,其他的一本也没有搞出来。建国后这么多年搞了什么史?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搞,比如说美术史吧,也搞了两三本,哲学史也是两三本吧。还有一些史,就根本没有出,因此,我们在规划里面,一共开了几十种带总结性的,或者说是研究性的书,不是整理的。这些东西,实际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们希望在座的同志鼓动一下,大家努把力,假如有哪些同志能够推荐或自己能做这些工作,花点功夫,可以三年、五年限搞出来。现在不是合同制很风行吗?哪位同志愿意订个合同,我愿意作为一方签字。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文心雕龙》探原,或《楚辞》注疏,《尚书》考证,而没有这些史,总不行吧。

下面讲一下争鸣的问题。争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出一本书,我们也可以照样出一本。能说你出了《文心雕龙》,国务院就下命令禁止?虽然说是出得多了,总比出《七侠五义》要好一些。《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还有类似的东西,解放前,有资格的书店

是不出的,商务不出,中华不出,世界书局也不出,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也不出,搞新文学的那些书店,与我们有关系的,比如生活书店,不怕国民党封书店,出马克思主义的书,决不出《三侠五义》。但像汇文堂就出,都是石印的本子多。现在除中华书局和北京几个大出版社不出之外,许多省都出,这就有点失格,就是失掉你的资格,高标准变成了低水平,无非是为了赚钱。百家争鸣,必须是争鸣。如果平铺直叙的,既无观点,也无内容,凑了二十万字,那我就不出。假如有自己新的观点,你拿出三本、四本、五本,真正百家争鸣,都能够承认。这就要产生一个问题,或者是有的观点不正确,或者是材料站不住脚,你就要接受人家对你的批评。

关于乾嘉学派的问题,这也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乾嘉学派,无非是搞考证吧。清朝从搞《四库全书》以后,把全国的书拿来翻一次,凡是有“胡”字的,有“匈奴”的,有“东胡”的,都把它圈掉删掉,然后抄几本放在文渊阁、文澜阁等等。大家就搞音韵、训诂、考证,不过问政治,转了方向。有一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如所谓“回到乾嘉学派”,以为当前的政治现实惹不得,关起门来搞考据为好。当时的乾嘉学派确有躲避政治的问题。但是仅仅这样说够不够呢?不够的。康、雍、乾三世,清朝得到休养生息的时间,经济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经济上有大的发展,文化上也就有一个大发展,而且这文化大体上都集中在扬州,集中在江南,这时就出了一批学者,搞汉学。开始的时候,还纯粹是搞汉学,但渐渐地也就涉及的面很广了,音韵、金石、地理(比如说《读史方輿纪要》,就是这个时候出的)。这里也有经世之学,即有用的学问,跟政治经济发展相联系的,这与清朝初年顾炎武那一个传统结合起来。到了后来,又出了一些有名的学者,搞《说文》,搞《尔雅》,稍微脱离了一点现实,专门去搞文字学了。但是这一批学者,你说他是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恐怕也不能这样说。我比不上教授们,读书读得多,我在学校里面是以闹事的学生出名的。但是念中学的时候,我确实也读过书。有一个教员,他教《经传释词》,这是很奇怪的,一直到今天,我还不理解,我们既没有念过经,也没有念过传,他竟然就把《经传释词》拿来教。当时我只十四、五岁,我倒是很用功的。王氏父子以及段氏的书,我念得很少,但对《经传释词》,我确实下了一点功夫,因为它不是随便乱说的,是有凭有据的,而且简单明了。要是《经传释词》拿给我们今天的人来写,可以出很厚的本子,它那一条,今天就要写几万字。我既没念过经,也没念过传,但我懂得它的内容,它也许对我的今天还有深刻的影响,我不算什么写文章的人,偶尔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写一点。有人说,你那写得太简单,是不是写长一点。我说,这怎么好把它拖长?我意思都说完了,我始终守着说完为止,空话少说。我想来想去,这是《经传释词》对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说清楚,没有闲言闲语。乾嘉学派,一个是有政治原因,一个是有经济原因,还有那个时候文化也发达,有人去研究这些东西,研究工作有客观环境。你看当时那些大家都是忙人,不是闲人,不是

陶渊明那样坐在家里写写诗了事。王家父子还是尚书,还要抽空来写这些东西,而且写得很好,也有人愿意看这些东西,有人跟着去研究,这些东西就发展了。乾嘉学派在这时期取得的成就,对于我们以后的古籍整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时代的前进,乾嘉时代也过去了。嘉庆过后就是道光、咸丰,帝国主义开始进来了,国际形势对中国不利了,中国的士大夫,中国的学者,他们想的又是别的问题了,也就不是从《说文》、《尔雅》,以及《尚书》、《易经》去想问题,因为从那里面想不出解决他们面前所遇到的有关国家命运的东西,因此有一批人起来反对它,这样,龚定庵这批人就出来了,乾嘉学派的功绩也就到此为止。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提出过,认为这些都是投降清朝的,不搞政治的,不造反的,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讨论它了。我认为这一学派好处多,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客观环境,因此就又涉及对清朝的评价问题。在座的有没有满族的人呢?在座的都是汉人?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相反的态度,满州人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统治中国有什么不可以?而且它实际上统治了二百多年,反对这个事实是不行的。明朝的那批人反满,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宣统都死掉了,你还反谁呢?过于强调清朝对于汉人的压迫,把汉民族和满民族对立到无可对立的程度,这样去看历史,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当时政治局面稳定,文化发达是自然的。这又是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宋明理学的市场缩小的结果。宋明理学的形成,是北宋、南宋政治上无可奈何,周围的少数民族跟它斗争,也很尖锐,他们躲在那个地方,搞唯心论去了。对宋明理学,作为哲学流派来研究,我也不反对,我们还要编一套《宋明理学丛书》。我们讲唯物论,但没有讲到唯心论,这还成为唯物论吗?这样唯物论就不存在了。唯物论是在有唯心论对立面底下存在的。乾嘉学派,从治学的方法上应肯定它是成功的,当然后来烦琐一点,这应该由后来的人负责,从乾嘉学派的人来讲,一部分是搞经世之学的,一部分是搞文字训诂的,他都有他的本领,《读史方輿纪要》有什么坏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继承它的治学方法,实事求是,每下一个结论,有材料有根据。我的意见也许比别的同志的意见肯定得多一点。把乾嘉学派搞成一分为二,一半对一半,一半好一半坏,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总有一个主导的东西,错是主导的?还是对是主导的?我想由于当时的经济原因,当时的客观政治因素,还有当时的文化发达,乾嘉学派本身就是文化发达当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认为,“回到乾嘉学派”的说法不正确,他说你来写马列主义,我不沾这个边,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刚才说要有新的见解,新见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你的见解就立不住脚。

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是不是稍嫌烦琐了一点?有的写一本书,开参考书可列到一百多部。这部书是不是需要一百多部参考书?是否条条材料都有用?还有注解注到这样的程度,讲到温州的事情,在“温”字下面加一个小号码,“温,今天浙江温州”,这也要注,还有什么不

要注呢？最近有人开玩笑，说《三都赋》有什么了不起，他那个时候，没有辞书，没有字典，搞了十年，才凑成一篇《三都赋》，要是在今天，把辞书搬他一大堆，把植物志、动物志、搬他一大堆，一翻，三天功夫就写好了。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你写《三都赋》，除了写木字旁的字，水字旁的字，兽类的名堂之外，该是还有一个思想问题，布局问题、对偶问题，还有一个念下去好听的问题，你还要解决这一些问题。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最近听人说的，他说的是辞书的用处和好处。现在的辞书替我们解决了好多问题，无关紧要的注释实在可以取消。去年出版的那套《红楼梦》，注释是可以的，简单，在万不得已时加一个注，或者加一个校。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三大本，大家评论如何，烦琐了一点吧。他引陈忠裕公诗，他第一卷引了，第二卷、第三卷还引，而且详细注明见《陈忠裕公集》几卷几页。现在也还有烦琐的，据说有个人，选了杜甫诗四十六首，写了二十万字的注解。这种学风，能不能提倡？杜甫有多少诗？照他这样笺注下去行吗？我认为搞注释要简单明了，必要的加以说明，不必要的，人人皆知的，可以让人在字书辞书里头去查，不然辞书就没有用了。

最后一个问题，提点要求。去年出版了231种古籍，数量是不少，但是文学书占了113种（重印本不计入），历史书66种，有关哲学的14种，综合性的16种，语言文字22种。按照现存的书籍来看，史书最多，我们编的这个规划里面，史书占大部分，但是整理出版的少，哲学更少，这是我们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大好的现象，跟时代不大符合的一个倾向性问题。文学多，历史少，哲学更少。是不是和各大大学打个招呼？这也涉及到社会科学院。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每年出的有关哲学的新书只有14种，有关历史的新书只有66种，文学书倒出了113种（当然也不算多），但比例上几乎超过史学书的一半，哲学只占它的六分之一，为什么？文学容易一点，比起哲学和历史要容易一点。这是不是有点避重就轻？是不是各大学的同志多提倡一下搞历史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多提倡一下搞哲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宋明理学丛书，找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开了一次会，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宋明理学唯心的东西都搞不起来，那唯物主义的东西就更难办了。所以，从去年出版的情况看，跟教育部关于文科的指导思想多少也有点关系，也跟各大学的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有点关系。大家多搞点历史，多搞点哲学的东西，这对今后更有意义，请各大学注意一下，更切实地把这情况改变一下。

1983年3月1日

《左传》“枕之(尸)股”杜注辨误

刘百顺

《左传》中记载枕股而哭共四起事件:

僖公二十八年:“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杜预注:“公以叔武尸枕其股。”

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将会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

襄公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产禭之,枕之股而哭之。”

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庄公,晏子“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杜预注:“以公尸枕己股。”

统观四起事件,死者都是不应杀而被杀,所以晏婴等才用“枕之(尸)股而哭之”的特殊方式表示对死者的哀恻。依照杜预的注解,是哭者将死者的尸体枕在自己的股上。这样“枕之(尸)股”便成了“枕之(尸)于股”,“枕”是使动用法,“之(尸)”后省略了介词“于”。但是,同是庄公被杀这一事件,在别的书中却作了不同的记载。《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作“枕君尸而哭”,《史记·管晏列传》作“伏庄公尸哭之”。二书所记虽有小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哭者在尸体之上。刘向《列女传》记杞梁妻事云:“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这也是枕在丈夫的尸体上哭。《国语·吴语》记载楚灵王不君,“三军叛王于乾谿。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畴趋而进,王枕其股以寝于地”。这个事件虽然和《左传》记载的事件不类,但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根据以上事例,我认为“枕之(尸)股”是哭者枕在尸体的股上,“枕之股”即“枕其股”,“枕尸股”是“枕尸之股”。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在僖公二十八年正是这样注释的:“首之字作其用,以叔武尸之股为枕也。”

但是,问题到此并不算彻底解决,我们还要弄清杜预为什么那样注释。《三国志·魏书·陈泰传》注引《魏氏春秋》载高贵乡公被杀,“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原来杜预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同类事件来注释《左传》的。但这显然是以今度古,春秋之时,确实有枕在尸体上哭死者的风俗,不能用后代的习惯去臆断前代的事情。正是杜预将“枕之股”注为“公以叔武尸枕其股”,将“枕尸股”注为“以公尸枕己股”,而别的书上又有不同的记载,才使后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甚至同一部书,竟有不同的叙述。《东周列国志》四十二回写叔武被误杀,“卫侯枕其头于膝上,不觉失声大哭”。而六十五回写庄公被杀,晏婴又是“枕庄公之股,放声大哭”。直到今天,学界仍然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孰是孰非,本文提供的几条材料或许可以证明。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新局面开拓者

——缅怀李一氓同志

周 林

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园地里百花盛开,硕果初现的时刻,新局面的开拓者李一氓同志悄然与世长辞,令人不胜依依。

一氓同志主持古籍整理出版的事业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7月中,陈云同志派人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志传达他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指示。陈云同志说:整理古籍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关系到子孙后代。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陈云同志希望有计划地通过标点、校勘、注释等办法加以整理,有的可以今译,“使搞理工的人也能懂得,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因此要下决心,建立领导班子,作出规划,“搞上三十年,就能培养出相当一批人,就不会后继无人了”。不久,中共中央发了文件,国务院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有中华书局、文化部、教育部、社会科学院、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负责人,主持这项发掘民族文化宝藏事业的就是李一氓同志。

中央指示中说,“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这使我们教育系统的同志深感责任重大,因为从全国来说,能够承担整理研究工作的力量,三分之二以上在高等院校,但是,由于“左”的干扰,多年来大家对文科建设比较轻视,整理古籍的工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特别是“文革”期间,先是“横扫四旧”,继而又搞“批儒评法”,借口整理法家著作,实质是颂古非今,被“四人帮”利用来篡党夺权。这种“盗寇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正如鲁迅所说,“结果只留下一片瓦砾”,队伍零落,工作荒疏。党中央和陈云同志高瞻远瞩,提出古籍整理的问题,又派一氓同志来主持,教育界的同志兴奋地说:这是功德无量。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那时他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东南分局秘书长,兼任军部军法处长。我从上海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旋任陈毅同志领导的江南支队军法处长。我深知,一氓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识渊博,文化素养深厚,又有卓越的组织才能,深受大家敬重,由他牵头来做这件事,不仅能开创一个新局面,且使我们能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1982年3月,国务院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一氓同志提出了一个到1990年为止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3100项的第一步规划。他说:是否再搞一个从1991年至2000年的规划纲要,“新纲要能否拿出点新主张。我不希望活到2000年,但作为小组,我们共同有责任”。那时,一氓同志已是耄耋之年,他响应中央号召,主动退居二线,但又受党的重托,倾全心于古籍整理,决心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开拓一个新局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氓同志的开拓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会后,我受原教育部的委托,负责制定高等院校开展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的方案,建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这个方案包括增设古文献专业,建立一批整理研究机构,争取1990年前培养600名古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和一批从事整理研究工作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确定第一批整理文史哲古籍的重点项目等。

1983年3月,我们召开工作会议时,一氓同志亲自到会指导。他平易、坦诚而又谦虚。在讲话时,开头便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我和周林同志合作,我当组长,他当副组长”,但是“必须声明一下,这个小组就是小组,不是行政机构”,“培养人才问题,教育部承担起来了,我们小组就不干预”。这一方面表明一氓同志对我们的信任,放手,同时也体现了他举重若轻的革命家气魄。其实呢,他胸有成竹,无论从培养人才到端正学风,考虑非常周密、深邃。

他主张把整理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强调搞点“新鲜的东西”、“要有新的见解”。他说,“新见解就是马克思主义见解,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你的见解就立不住脚”,观点不正确,材料又站不住脚,“你就要接受大家对你的批评”,“百家争鸣必须是争鸣”。所谓“新鲜的东西”,就是要把整理研究的面搞得“宽一点”,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主要人物或主要的题目上,避免重复劳动,而有些题目又长期空缺。他引导大家“多搞点历史,多搞点哲学的东西,这对今后更有意义”,文学的多,哲学和历史的少,“是跟时代不大符合的一个倾向问题”。他回忆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提倡研究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但许多方面至今空白甚多。他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文心雕龙》探原,《楚辞》注疏,《尚书》考证,而没有这些史,总不行吧!”

对古籍中所反映的我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民族冲突的情况,一氓同志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内部发生的历史现象,今天“过于强调清朝对于汉人的压迫,把汉民族和满民族对立到无可对立的程度,这样去看历史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因此,一氓同志对民族古籍的整理非常重视。

对待历史上形成的学说和学派,一氓同志强调要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考察,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应简单地“划阶级”,贴标签,比如宋明理学,要作为一